



坚定文化自信
弘扬中国精神

“华语语系文学”：必也正名乎

□钱 翰

“华语语系文学”的概念，名不正则言不顺，之所以有这样一个不正之名，是潜藏在这个概念背后的“去中国化”的意识形态的干扰。如何面对中国，如何面对中国与“世界中的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包容不同的立场、认知和情感，但是不能让这种意识形态干扰了对事实的客观认识，也只有以客观事实为基础，才能有真正的包容力。

近些年，“华语语系文学”概念在国际中国学界兴起，最开始的提倡者史书美用这个词组来翻译sinophone literature，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她说自己“用‘sinophone’ literature一词指称中国之外各个地区说汉语的作家用汉语写作的文学作品，以区别于‘中国文学’——出自中国的文学。”在她看来，sinophone literature类似所谓英语语系文学(anglophone literature)或者法语语系文学(litt é rature francophone)，是一种与殖民历史相关的文学。然而这种论述存在很大问题，一方面她把中国看成是类似英法西等现代世界性殖民国家，明显不符合历史事实；另一方面她提出的这个概念实际上是要用一个概念把在中国大陆之外的创作集合起来，强调这种或者说这些文学与中国中央政府管辖之地的文学的差异，切割海外华人与中华传统之间的关系，建构起与中国中心的对立面。史女士名之曰华语，而实质是“去中国”，然而中国既去，何来中华？没有中华，何来华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道理并不难理解。史书美的偏激和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使她遭到了比较多的批评，虽然她的观点一时之间激起千层浪，但是赞成者并不多。

王德威接纳了史书美的“华语语系文学”概念，然而有相当大的改造，将得更加温和与包容，修正了她的“去中国化”，把中国大陆的文学也纳入华语语系文学之中。虽然同样是“华语语系文学”这个概念，但是内涵和外延已有不同。王德威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史书美咄咄逼人的对抗性，把各种不同类型的汉语写作纳入到同一个视野中，看它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关系，以及如何发生关系，试图建立起巴赫金所谓众声喧哗的对话性场域。应当说，王德威所使用的“华语语系文学”比史书美在学理上更有效，更具有弹性，少一些对抗，多一些对话，这也是他在中国学界引发较大的反响和呼应的的原因。

然而，这个概念的先天不足还是导致了思想上的混乱，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以各种不同的姿态和思想观念，参与到“华语语系文学”的讨论中，混乱显得越来越严重。子曰：“名不正，则言

不顺。”因为这个概念的名不正，所以必然引发混乱，导致言不顺。

首先，“语系”是什么意思？无论史书美还是王德威，都没有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语系在现代汉语中是一个纯粹的语言学专业术语，是比较语言学建构起来的语言分类法。世界上从来不存在华语语系，只有汉藏语系，也不存在所谓英语语系、法语语系，只有印欧语系。这是简单的常识，史书美和王德威都不可能不知道，之所以如此，只能是出于某种“不得不然”的原因——也就是为了消解中国中心，他们都放弃了在学术上更明确的“汉语文学”概念。

史书美认为，因为有英语语系文学(anglo-phone literature)或者法语语系文学(litt é rature francophone)，所以就有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她一股脑把好几个问题都混到一起，甚至令批评者分析其毛病时，都感到棘手。一则，anglophone literature 或者 littérature francophone等等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它们能被翻译成所谓“× × 语系文学”吗？这是个非常奇怪的翻译。据我所知，国内的法语界并没有人把litt é rature francophone翻译成“法语语系文学”，通常的翻译是“法语国家与地区文学”，意思是法国之外以法语为母语的作家创作的文学。史书美和王德威从来没有恰当地论证过用“英语语

系”或“法语语系”来翻译的合理性，而以此个术语为基础的平移概念“华语语系文学”自然也没有扎实的基础，这个“名”的下面，只是一层薄薄的流沙。

因此，王德威在这个问题上的含混完全可能看成是一种症候性的表现。例如，他在《华夷风起——马来西亚与华语语系文学》一文中，提到海外华人的创作：“生在台北，长在马来西亚，就学、定居在英国的欧大旭，以及生在马来西亚，在英国求学，在南非定居的陈团英都曾获布克奖(The Booker Prize) 青睐；后者甚至有‘亚洲布克奖’之称的曼氏大奖(The Man Asian Literary Prize) 的得主。他们的作品在严格定义下是英语语系文学的最佳示范。但如果我们将后夷民的论述带入华语语系讨论，这些作家一样可以进入我们的视野。此无他，他们的英语写作延续了马来半岛的多重语言的传统，‘马来英语’也是相当数量的华人所灵活转换的日常语言。华夷交错的语言现象固然以英语呈现，但在表达的过程中，已经不可避免地将语境华语化了。更重要的，这些作家是代表马来西亚写作，相对中国，他们原本就是夷，就是他者、外人。”

在这段话中，王德威急切地想把任何与“华”相关的东西统统纳入“华语语系文学”的大框子，只要与华人或者汉语有关系。然而，不仅马来西亚的华裔有英语的创作，法语区的华裔也有法语的

创作，西班牙语文化圈的华裔还有西语的创作，如果他的这个逻辑成立，“华语语系文学”不仅包括中文的写作，还包括英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的写作，这个“华语语系”可真成了无所不包的神奇语系，或者用世界语系来命名更加准确一些。于是这个“英语语系文学”的最佳示范又变成了“汉语语系文学”的示范，而且他当然也很清楚，并不解释一个写作是如何横跨两个语系的。

王德威试图用华语语系文学的大框架，把尽可能多的异质性因素都装进来，不是因为他不明白其中可能造成的混乱，而是他与史书美都有类似的目标：消解“中国性”，这可能是基于政治的意识形态，也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生活经验。他批评史书美不应与“中国”对抗，取而代之的方式是把一切都混杂在一起，没有边界，也没有中国和边缘，这样无需激烈的对抗，中国性在“华语语系文学”的宏大框架下，自然就消解于无形。然而，他也不是没有发现其中的问题，在《华语语系的人文视野与新加坡经验——十个关键词》一文中列举的关键词中，新加坡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的关系也是无法绕过的关键问题。无论是林文庆还是邱菽园都扎根他乡，心怀故园。他所说的移民、遗民、夷民，本身都是相对性的概念，倘若没有那个“中国”的存在，也就无所谓移民、遗民和夷民。这个问题并不能通过加一个后字，以所谓“后移民、后遗民和后夷民”的概念就能解决的。“中国文化在世界”和“世界中的中国文化”必然以复杂的方式不断纠缠下去，在变易和不易中延续其生生不息的命运。

“华语语系文学”概念的产生体现了海外汉语文学界的焦虑心态，他们不希望继续作为中国文学之附属，面对中国文学这个庞然大物，他们要求主体性，要求发出自己的声音，与中国文学能够平等交流。我们必须承认，这种诉求有其合理性，海外汉语文学不应被简单视为中国文学的一个小小

的支流，它们不仅是中国文化之果，也是东南亚、北美、欧洲的文化之果，它们是多重文化杂交重生的产物，充满勃勃生机，有其独特的精血和灵魂。然而，这种基于价值的诉求不应影响科学和客观的学术问题。如果我们真正借他山之石，可以看看法语中对此是如何分类的。所有以法语写作的文学，分为三类：litt é rature francaise (法国文学)，litt é rature francophone (法语国家与地区文学)，litt é rature d’expression fran-caise (以法语写作的文学，也就是母语非法语的作家以法语写作的文学)。总体的分类可以看成两种，前两者都是法语为母语的作家的文学，后者是法语非母语的，而法语为母语的情况分为法国和法国以外的。参考这种分类方式，所有以汉语写作的文学也可以分为：中国文学、汉语文学（中国之外以汉语为母语的文学创作）、以汉语写作的文学（非汉语母语的作家的文学创作）。这种分类方式清楚了，尽可能减少了交叉和含混，也更多的基于客观事实，尽可能少意识形态的考量。文学是一个充满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对话和冲突的场域，正是因为如此，在文学研究的时候，就应该尽可能达成对客观事实的共识，只有清除了意识形态对客观事实认识的干扰，在这个场域中的对话者才能更加清楚地认识各自的立场、观念和价值感。

“华语语系文学”的概念，名不正则言不顺，之所以有这样一个不正之名，是潜藏在这个概念背后的“去中国化”的意识形态的干扰。如何面对中国，如何面对中国与“世界中的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包容不同的立场、认知和情感，但是不能让这种意识形态干扰了对事实的客观认识，也只有以客观事实为基础，才能有真正的包容力。在正名之后，汉语文学的研究者才能更好地交流和交锋，才能在一起好好说话。

“华语语系”中的洞见与不见

□朱崇科

“华语语系”(Sinophone)，作为华文文学和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相对新鲜而又热门的术语，其流动性和复杂性也是如影相随。在研究者方面，主要代表人物是王德威和史书美。前者有多篇论文，而且将理论概念付诸实践，组织华文文学作家工作坊，甚至将之推上了哈佛的讲堂；后者作为近些年影响日益凸显的女学者，其2007年出版的论著《视觉与认同》集中体现了其敏锐的思考和深刻的偏见。

毋庸讳言，一个崭新术语的出现，未必一定意味着研究范式的更新，但往往不乏开启新思路、引发新意识的催化作用。“华语语系”的出现，自然不只是语汇的更叠，其背后更是有关中国文化/文学内部的权力话语组织结构和外部的国际化运作、论争等的错综交织，这里面既有推进我们自身研究的丰富可能，又不乏悖论与偏见。作为置身其中的研究者，我们要有所回应，更重要的是建立一种平等对话关系，亮出观点、正本清源。

新的崛起：界定与洞见

一般而言，“Sinophone Literature”或可理解为华语语系文学或华文文学。当然，这样的初步理解都是权宜之计，我们不妨来看看各家多元并存的界定。

王德威：“包括在外”。在王德威这里，华语语系文学主要是指以华文书写的文学，但同时，他更将此文学置于英语语境的独特脉络中，“这一文学可以铭刻在地作家失语的创伤，但同时也可以成为一种另类创造。异地的、似是而非的母语书写、异化的后殖民创作主体是如此驳杂含混，以致成为对原宗主国文学的嘲仿颠覆。上国精纯的语言必须遭到分化，再正宗的文学传统也有了鬼魅的

海外回声。”需要强调的是，王德威对华语语系文学的离散性的强调是有限度的，它从某种意义上纠偏了罔顾差异、单纯类比其他语系后殖民意味的泛滥，所以，他可以相对宽容地一方面强调“离散”，而另一方面却又反对顾影自怜，自我膨胀。

不难看出，在王德威那里，华语语系文学的提出既能在英语语境里游刃有余地提升话语身份，这个概念本身又是在确立各区域华文文学主体性基础上包含了中国大陆文学的综合性指称。

史书美：反殖民/去中心。如果暂时切断华语语系文学与早前的华文文学“多元中心”论(周策纵、王润华提倡)观点的维系，史书美算是西方语境中较早集中探讨华语语系的学者。

2004年，史书美将华语语系文学界定为：世界各地除中国大陆以外和大陆边缘以华文为母语的作家用华文的创作，用以区隔中国大陆的中文写作。不难看出，史的界定有强烈的去中心意味。如前所述，此概念的提出，绝非一个新名词的孤立浮现，它同时也具有更深层的功效，其中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则是去中心化与反殖民色彩。毋庸讳言，有关20世纪中国文学与华文文学某些术语的确定自有其权力话语的渗透，比如，早先的提法，海外华文文学实质上不包括中国大陆的华文文学命名以及类似的概念——世界华文文学等等，往往也或多或少难免大中国中心主义的弊端。

华语语系一词帮助我们重新反省中国大陆文学和其他华人区域文学之间的繁复关系，尽量突破偏狭的中国中心主义，而更多采用多元并存的视角看待这种既互相呼应、对话、纠缠，同时又往往从本土性和政治属性上主体性浓烈的事实。华语语系概念提升了各区域华文文

学的地位，同时也通过跨学科的关联性思考强化和丰富有关区域华文文学研究，比如如果通过华语语系视角看待新加坡华文文学，同时也可以关联新加坡华人社会，乃至更庞杂的“新加坡学”。

“华语语系”文学去中心的首要操作就是要去“国族文学”框架下的意识形态局限。王德威将之视为“一个辩证的起点”，“华语语系文学所呈现的是个变动的网络，充满对话也充满误解，可能彼此唱和也可能毫无交集。但无论如何，原来以国家文学为重点的文学史研究，应该因此产生重新思考的必要。”

其次，华语语系概念又有一种反支配或反殖民倾向。处于中国大陆以外/边缘的华文文学书写，在成长过程中往往充斥了焦虑和彷徨，但自有其可能的主体性与发展规律(尤其是相对成熟的区域，比如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所以，其文化心态往往有着独特的暧昧与复杂。当然，真正的去中心化和反殖民也包括，针对英语以及相关文化可能的殖民强势色彩，华语语系无疑可以更好的保护自己的主体性。

第三，华语语系文学更是具体个案的众声喧哗，它不形成一个新的统一中心，而更注重对本土自我的形构。华语语系文学背后强烈呈现出对华文文学本土性的有意强调，这也和笔者的主张不谋而合：只有对各区域华文文学的本土性展开更深入的了解和切实的尊重，对话并彼此借鉴，才可能建构和而不同的中华文学。

史书美的论述更多是华语语系论述(Sinophone articulations)，这实际上比华语语系文学更宽泛些。当然史书美还有更大的野心，那就是将华语语系上升为一种认识论，甚至希望强调华语语系和其他理论的对话性与连接性。

话语建构中的不见

作为一个极具针对性、批判性，又有强烈主体性的术语，华语语系文学对地域的重新切分，在文化/文学的旗下下，不乏权力暗流的涌动，甚至有需要小心探勘的迷思缠绕。

路殖民的过度泛化
史书美将华语语系(文学)纳入跨国和跨殖民研究中，这一方面增强了其批判性，但另一方面却也让她陷入了过度发挥的偏见中，虽然这偏见往往貌似深刻。

在实际运用中，史书美轻而易举卸掉了华语语系、英语语系、法语语系等语系之间的差异，那就是中国从未以任何军事方式、文化思想方式殖民目前华文文学所在的其他区域。这是和西方殖民者的操作实践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们往往是通过军舰、大炮、传教士等手段掠夺被殖民者的财富，又顺便通过殖民方式美化宗主国的文化传统，同时妖魔化被殖民者。这是后殖民概念使用的错置。

史书美在她的论著中分别论述了台湾和1997年以前香港作为“被殖民地”关系的两个个案用以陈述华语语系的批判性，其实这种做法更呈现出她跨殖民理论的过敏。众所周知，曾经作为殖民地的台湾和香港，其历史境遇中的真正殖民者恰恰分别是日本和英国。通过有意遗忘或忽略这段惨痛的历史，不去真正发挥跨殖民理论在此议题的效力，而将矛头指向当今中国大陆，实在是本末倒置。而实际上，我们稍微具体化日本殖民台湾和香港回归前的文化/文学，恰恰都有以本土华文文学对抗殖民者的有意操作。而在类似的马来亚华文文学中，1930年代，鲁迅逐渐成为他们的思想导师，用来对抗英国殖民者和后来的

日本侵略者等文化殖民者。这些都不难说明，中华文化及其组成部分完全可以成为反殖民的依赖。

对抗性贫血
或许正是为了增强杀伤力、争夺更大的话语权 and 吸引眼球，史书美采取了相当具有颠覆性和对抗性的语汇，比如“反离散”、借用“定居殖民主义”等等。平心而论，上述观点不乏壮士断腕、釜底抽薪的勇气，但同时此观点却又因了政治意识形态的介入而不乏偏执。

相当吊诡的是，史书美的华语语系剔除了中国大陆文学主体部分，而呈现出一种对抗性的贫血。众所周知，无论从文学生产数量(出版、读者、作家、学人培养等)，还是华语文学的延续性、载体规模等，中国大陆都是无可替代的中心之一。如果矫枉过正，那么“华语语系”就成了关起门来自己过家家的短命操作，它要么变成了和人性日益疏远的族群研究，很可能被边缘化；要么落入本土门户主义自生自灭的窠臼中。某种意义上说，这和中国中心主义、大汉族沙文主义共享了粗暴而短浅的思维逻辑。

如果平心静气地思考和界定华语语系文学的边界，暂时创除既有的文化政治干扰；如果单纯锁定文学研究，理想化一点，所谓华语语系文学其实就等于华文文学/华语文学。它也难免华语文学的缺憾。因为这个概念同样也必须面对更复杂的文学议题：比如，华文文学书写以外的华人文学创作如何涵盖和囊括，如何涵盖华人文学中的其他语种创作等等，都是未能涵容的问题存在。

如何突围

在我看来，在华语语系涵盖的范围内，在相对成熟的华文文学区域内，完全可以产生“本土中国性”(native Chi-

neseness)。它既和更大范围的中国性有交集，同时，更属于本区域内部本土性的一个层面。虽然从理论上假设，可以使用相同的华文字符表达完全不同的含义，使之属于另外一个表意群体，但在实践上几乎不可能，因为那不亚于甚至更艰于创造另外一门语言，因为，你还是使用已经表意非常丰富的熟悉文字。从这个意义上讲，华语语系文学中的中国性，尤其是文化中国性几乎是永远的。

政治实体之间，可以采用不同的政治理念互相区隔，但华文所关涉的文化区域不可能完全割断文化关联，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几十年、上百年仍然无法改变台湾闽南话与福建闽南话、香港话和广东话之间的巨大交集。从这个角度看，各个华语语系文学区域的生产必须汲取和借鉴中国大陆文学的经验与资源。

华语语系论述除了理论争鸣以外，必须要紧密结合个案作家——他们既可能是例证，又是突破的新的可能性，或许也是更新术语内涵和研究范式的精妙承载。从这个意义上说，各个区域的华文文学创作必须先创造出更多的经典，这无疑既是不同区域华语文学辩证、对话、比较的基础，又是发展和升华理论深度和高度的载体，良性互动如要展开则缺一不可。

华语语系(文学)话语自然是一个颇具冲击力的话语论述，既有相对独特的立场和洞见：兼具本土性观照，重视区域华文文学，同时又可以让入具有跨学科视野。当然，它还有更多不见：比如，作为一个理论术语，它的可操作性并不强，具有含混和空洞性，有很多既有的论述，拿掉这个术语一样清晰可辨；同时，它自身也有一些理论的矛盾性需要克服，其自治性尚需提高。